

●今日聚焦



地名修改 不可搞“文化强拆”

国务院第二次全国地名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22日提出,将重点清理整治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等不规范地名。地名是基本的社会公共信息,承载着历史与文化。规范地名就是留住文化根基和历史传承,切不可因长官意志或眼前经济利益而“任性”修改。

翻开一些地方地图,“大、洋、怪、重”的地名随处可见。“普罗旺斯花园”、“威尼斯水城”、“新西兰小镇”,一些城市建筑以起“洋地名”为时尚。一些地方地名保护意识淡漠,延用千百年的地名说改就改,导致许多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地名消失。据民政部统计,近30年来,我国有6万多个乡镇名称和40多万个村子名称被废弃。

地名是一地的文化符号,凝聚着当地群众的归属感。随意换地名,无异于一种“文化强拆”,会引起一系列后续问题。例如,大量改名换牌,必然耗财费力;耳熟能详的地名一夜之间从地图上消失,不仅给群众的出行和生活带来不便,也丢失一个时代的群体记忆。

从根源上分析“任性”的改名举动,暴

露出一些地方官员用权上的“霸蛮”。一些地方秉持“图响亮傍大款”的心态,受短期经济利益驱动,“靠山吃山,靠水吃水,靠名人吃名人”,肆意修改延续千年的地名;有些地方官员甚至把改地名当作搞封建迷信的手段,如某地因“骆马湖”有“落马”的谐音而要求改为“上马湖”。在缺乏认真分析和科学论证的情况下,领导大笔一挥,想怎么改就怎么改,根本不考虑地域文化的传承和群众的意愿。

《地名管理条例》要求,地名管理应当从我国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,保持地名的相对稳定。地方政府部门应该依照法规办事,以严格的制度刚性杜绝乱改地名的现象,绝不能为迎合某些人的不合理要求而随意破例。

地名是承载历史和凝聚认同感的“容器”。诚然,对于那些带有歧视性的地名,该改还是要改。但在改名的过程中,应严格按照法规操作,重视民主决策的程序,尊重民意吸纳民智,绝不能让地名遗产被“文化强拆”。

新华社记者郑昕、欧甸丘

●观点纵深

规范地名 要有法可依更要违法必究

地名是最能体现一个城市人文底蕴的地理信息,特别是一些老地名,有源远流长的文化积淀,有事过境迁的烟雨沧桑,是城市变迁的刻痕印记。

国务院早在1986年就出台《地名管理条例》专门规定,“地名管理应当从我国地名的历史和现状出发”,“不以外国人名、地名命名我国地名”。遗憾的是,正是其后30多年间,乱改地名现象不断发生,甚至出现了贪大、媚洋、求怪等现象。其背后,则是惩戒乏力,追责不力。

地名的更改与否,改成什么地名,本当遵循一定程序,征求当地居民意见,尊重历史文化因素。现实中,却很少有规范更改地名的情况,一个地方的名称多是由时任主政者根据喜好乃至风水而随意更改。一些小区或楼盘的名称,更是取决于开发商个人喜好,只要开发商喜欢,只要能取得良好的销售业绩,无论什么名称,便可为我所用。

据此,《地名管理条例》中的相关规定实际上被架空,沦为一纸空文。其原因在于,有禁止随意更名的规定,有禁止更改外国地名的规定,却无相应的违法后果,以

史洪举(法官)

●热点观察

从医患关系的角度 看病历书写规范的必要性

近日,江苏连云港市一市民“去医院看病,发现医生写的病历和处方上的字潦草难认”的消息,再次引发网民集体吐槽。近年来,全国多地曝出医生书写病历潦草随意,甚至酷似“天书”,让病患者捉摸不透。(3月23日《北京晨报》)

有关于病历书写规范的问题,在舆论场中几乎早已呈现出一种“审丑疲劳”。虽然卫生部门2010年制定的《病历书写基本规范》要求,病历书写应规范使用医学术语,文字工整,字迹清晰,表述准确,语句通顺,标点正确。然而,6年来这一规章的现实效果显然有限。

“天书”病历的症结到底何在?不少人站在“专业”的角度认为,医生的就诊量太大,所以出于效率的原因,对于病历的书写难免从快、从简,从而导致在书写规范性上打折扣。这一现实原因,当然有,也未尝不能理解。但且不说为了速度而牺牲“质量”难以让人接受,“天书化”的病历可不仅仅出现在现代大医院的就诊室里,在相对不那么“繁忙”的基层卫生院,潦草的病历书写也很常见。可见,将不规范病历都归咎为医生太忙,不完全符合实际。

随着现代医患关系向更平等方向的发展,“天书”病历已经呈现出越来越大的不适。这正是近年来,不规范的病历问题引发越来越多的讨论和质疑的主要原因。要看到,患者反感的不只是病历字迹的潦草,本质上还是因之带来的

某种就医信息的模糊。在这个意义上,病历的书写规范,最终落脚点还是要回到医患关系的完善上来。

现代医患关系中,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越来越受到关注。这种不对等局面多数是基于职业属性与专业门槛所决定,有些则可能是由于人为因素放大和加剧——比如一份对于普通人而言几近于“天书”的病历。首先,相较于书写规范,让患者易于辨识的病历,一份不知所云的病历,难免让人对于医生的就诊态度打折扣;其次,病历信息难被患者知晓,只会进一步加大医患之间的信息隔阂。就此来说,病历书写的规范,看似只是细节,对于弥补医患关系其实大有裨益,是增强患者信任的一道不可忽视的环节。

当然,改变肯定难以一蹴而就。一是职业习惯的问题,二是可能还有利益的问题。事实上,一提到“天书”病历的成因,不少患者最先想到的是医生为留住患者在本医院购药,从而为自己“增收”。这里或许有“有罪推定”的成分,但消弭这样的“推理”,最好的方法莫过于书写规范化。

目前相关部门对于“天书”病历所开出的一个最重要“处方”,便是大力推行电子化病历。从大的方向来说,这的确是一种必然趋势。但就现实而言,由于电子化病历普及所必须具备的成本和条件,注定将是一个难以短时间内实现的事。所以,强化医院内部的管理,推进病历书写的“与时俱进”,以跟上患者知情权的需要,其实更为迫切。

朱昌俊



贪官的两把“刀”

3月22日,广州市住房保障办公室征收储备处原副处长黄华辉因涉嫌受贿8891万元受审。黄华辉曾任广州市政府征用土地办公室、广州市土地开发中心土地征用与整理一部副主任科员等职务,多年来只是一个科级小干部,却长期插手旧厂房的征地拆迁补偿工作,帮一众相熟的老板们赚得盆满钵满,自己也从中收受巨额外利益。

(3月23日《南方都市报》)

一个科级小干部,涉嫌受贿8891万元,给人的震惊虽不如几年以前,但不可谓不多。而梳理大大小小的官员贪腐路径,大致可以归纳出他们有两把“刀”:

一把“刀”,是吴思先生在《潜规则》一书中说的合法伤害权,即合法祸害别人的能力。官员掌握权力,可谓“身怀利器”,有些人为图心安会试图贿赂,未必指望捞什么好处,仅仅是希望别被使绊子。这时候,若是官员没有意志力,很容易被腐蚀。

另一把“刀”,是学者洪振快在著作《亚财政》里提出的合理赐福/利权。洪振快认为,权力是一种影响他人福利的能力,影响的方式有两种:一是减少,一是增加。减少他人福利而不违法,就是吴思先生说的合法伤害权;增加他人福利而符合规定,这是合理赐福/利权。合理赐福/利权也有两种方式:一是对你的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二是直接通过权力运作赐予你福利。

这两把“刀”,是贪官的看家本领,种种资源和财富正是据此分配并重新调整。一些人或祈其作福,或畏其为祸,于是纷纷或主动或被动地奉上财帛。权力越是不受约束,行贿者越如逐臭之夫,受贿者会越发胆大妄为。

这两把“刀”,也对应了刑法对受贿

罪的定义: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,索取他人财物的,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,为他人谋取利益的——收取他人财物,就合理给予你福利;索取他人财物不得,就合法伤害你。

这两把“刀”的锋利度,未必与职位高低相关,而与权力的能量成正比。一些小官为何动辄能贪腐数千万乃至上亿元?无他,资源分配能力大罢了。比如黄华辉,检方称其伸手之处,除了征地拆迁,还包括绿化防护林工程、地块复绿工程等,能量不可谓不大。

不管大贪还是小腐,腐败说到底是因为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。要约束这两把“刀”,最好的方式还是将其收入“刀鞘”,即中央屡次提出的“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”,用制度监督、规范、约束、制衡权力,保证权力正确行使而不被滥用。

合法伤害权、合理赐福/利权,当然不是真正的合法合理,而是指通过貌似合法、合理的方式。当权力在制度的轨道上运行,这两把“刀”就做不到“貌似合法、合理”。如此,心怀邪念的官员才会有所忌惮,即便撑起胆子,也只是“关公面前耍大刀”,徒增笑料罢了。

这两把“刀”,虽然不是直接割向民膏民脂,但最终会转嫁到民众身上。我们期待着制度越来越完善,让贪官的“刀”早日入鞘。

吴志明



关注
“志明有话讲”,请扫描二维码,或搜索添加同名公众号。